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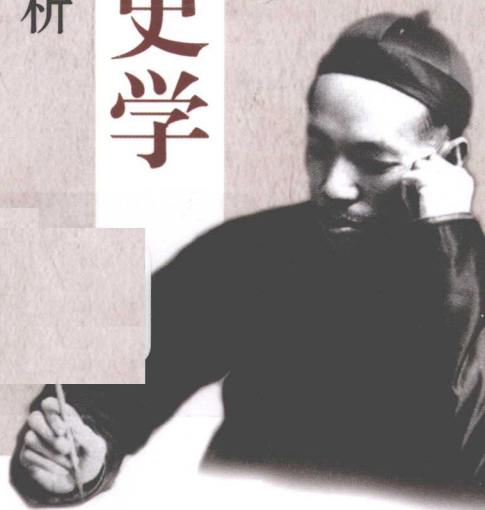
梁启超

与中国现代史学

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

石莹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梁启超

石莹丽

著

与中国现代史学

以跨学科为中心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石莹丽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004-8952-8

I. ①梁… II. ①石…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 —
思想评论 IV. ①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2708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孙晓晗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字 数 266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若为 20 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史学家排座次，梁启超恐怕要居于首席。梁氏是中国史学划时代的人物。他不但是传统史学的终结者，更是现代史学的开创者。以往学界通常视梁启超为晚清“新史学”思潮的主将，冠之以历史统计学、心理史学第一人等头衔。其实不只于此。梁氏不只是某一流派或学科的先驱，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史学的始祖和领航者。他所首倡、所塑造的“新史学”，不是对传统史学的局部翻新和改造，而是根本性的颠覆，同时开启了一种现代史学的新范式。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谱系中，梁启超位于最尖端，而后起的胡适、郭沫若则要低一层级。这是因为，梁氏之后中国史学的若干关键性变动，几乎都源于梁启超的“新史学”。毫不夸张地说，20 世纪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梁氏“新史学”理念的实践和引申。梁启超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轴心人物，其庞大的身影笼罩了百年中国历史学。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梁氏“新史学”的诸般创获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跨学科”治学门径的开辟和倡导。与社会科学结盟、推行跨学科研究，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最典型的特征。这一趋向根本刷新了史学研究工作的手段和模式，扩充了观察历史现象、思考历史问题的理论工具，提高了历

史分析和历史阐释的精准度，实现了从叙述史学向问题史学的转化。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史学方法是历史研究的中心环节，跨学科研究引发的方法论变革直接带动了整个历史学的全方位发展，其研究课题、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都出现了大面积调整，社会史、经济史取代政治史、事件成为新的方向，与各门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地带形成新的专门领域，关注视野也实现了自上而下的转移，民间历史成为焦点和重心。可以说，跨学科门径的引进和实施，促成了中国史学由传统到现代的范式转换。而梁启超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一个奠基者的角色，其地位无能出其右者。近人或谓梁氏治学失之粗疏，影响甚大而成就甚微，不足以垂范后世。然而，由跨学科研究一端即可窥见，梁启超虽乏精深绵密的专门著述，但其筚路蓝缕拓荒发轫之功实不容抹杀。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点语焉不详，未有充分的重视和注意，梁启超的跨学科尝试遂被其他贡献所掩而湮没不彰。有鉴于此，我授意博士生石莹丽女士以此为题撰写学位论文，她欣然接受，知难而进，历经三度寒暑而毕其功。此书正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充实而成的。

本书以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为双重维度，从二者的交集上观察梁启超在地理史学、社会史学、经济史学、心理史学和历史统计学等领域的开拓性贡献，集中呈现梁启超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对社会科学与史学的关系进行总结和反思，既肯定了跨学科研究的正面价值，又对跨学科研究存在的误区予以指正。此书初步清理了梁启超的跨学科路向，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不过，需要补充的是，梁氏的跨学科研究不仅表现为史学方法论上的巨大转换、新领域的不断开辟，即便是最为人所称道的历史观的建构，如进化论、民史取向等也不局限于史学层面（西史、东洋史），而是更多地借取

了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思想资源。由此可见，跨学科方法对史学研究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值得进一步掘发。

从整个书稿的写作来看，作者从扎实的一手材料出发，几乎浏览了见世的梁氏的全部文献，而整部书稿论从史出，观点平实，少见凌空蹈虚之处。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并不就事论事，而是把所要讨论的问题植入特定的学术脉络中，有源有流，清晰了然。全书结构合理，布局谋篇颇为用心，章节设置恰当，各部分规模大体均衡，词能达意，引证规范，逻辑性强。本书最大特色是均衡，是中规中矩。但由此而带来的一个弱点，是创造性思考不足，自出机杼之见略少，缺乏强大的思维穿透力。作者围绕中心问题详细铺排资料，梳理过程，但论断大多点到为止，少有进一步的引申和发挥。老实说，本书目前所呈现的面目，与我最初的期待尚有不小的距离。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盼望石莹丽女士今后能够以此书为起点，勤读多思，增广见闻，在学术研究方面锐意精进，更上层楼。

王学典

2010年10月

目 录

引言	(1)
一 梁启超生平及学术述略	(2)
二 梁启超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现状	(9)
三 本书思路与方法	(21)
 第一章 过渡时期的中国史学界	(25)
第一节 西风东渐与晚清新学	(25)
第二节 救亡与革新——“新史学”的现实诉求	(29)
第三节 走向跨学科——“新史学”的方法论特征	(32)
 第二章 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先行者	(37)
第一节 早期人地关系研究	(37)
第二节 梁启超对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的思考	(42)
第三节 历史人文地理学在中国的持续发展	(58)
 第三章 从社会学角度阐释历史	(65)
第一节 社会学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传布	(65)
第二节 梁启超应用社会学原理解剖历史的 具体创获	(71)
第三节 社会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嬗变	(125)

2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

第四章 援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解析历史	(131)
第一节 西方经济学的输入	(132)
第二节 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跨用	(137)
第三节 梁启超之后经济史学的扩张和兴盛	(181)
第五章 心理史学的开风气之人	(188)
第一节 西方心理史学的诞生和发展	(189)
第二节 梁启超在历史研究中对心理学知识的借鉴	(198)
第三节 心理史学在中国的勃兴及成果	(231)
第六章 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行	(238)
第一节 从传统到现代——西方历史统计学的历程	(239)
第二节 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拓荒和奠基	(242)
第三节 历史统计学在中国的深化和变迁	(260)
结语	(269)
一 跨学科方法的学术史意义	(270)
二 梁启超之后“跨学科”理路的延续	(279)
三 “跨学科”方法的局限性及其面临的挑战	(293)
参考文献	(303)
后记	(318)

引 言

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这样记述了他的出生：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①

而立之年，把自己的出生与世界大事和政治要人联系在一起，显示了梁启超当时的年轻气盛与雄心抱负。时势出英雄，“时代给予梁启超以机会，而梁启超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②。在梁启超不算长的生命历程中，他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上，影响了一代人，成为中国学界诸多领域的“执牛耳”者。1929年1月19日，这位曾经引领中国政坛与史坛几十年的政治家兼国学大师以56岁之龄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是年乃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一年，五四运动后十年，《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创刊及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第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之岁也。

① 《三十自述》，《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页。以下凡引自《梁启超全集》者，均不再注明作者、出版社和出版时间。

②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一 梁启超生平及学术述略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梁姓自北宋始由秦地同州迁入广东，世居茶坑村。梁氏祖上十世为农，至其祖父梁维清时，才有志向学，曾捐为附贡生，过上了“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的乡绅生活。其父梁宝瑛，一生勤奋，亦习举子业，但始终未能金榜题名，遂教授于乡里，并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曾长期主持乡政，在当地颇有势力。其母赵氏，出身书香门第，能诗能文，知书识礼，以“贤孝”闻名乡里。梁启超生性聪慧，四五岁开始读书，即习“四书”、“五经”，深得祖父喜爱，往往日则教读，夜则随寝。祖父和父母均是梁氏之启蒙老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梁启超度过了快乐难忘的童年。加之祖父常常与儿孙说起南宋故事，在幼年梁启超心中留有深刻印象，对梁氏爱国思想之形成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梁启超少年得志，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此前两年，他曾就读于学者阮元创办的广州学海堂，热衷于经、史、子、集及辞章训诂之学。18岁时，由父亲陪同入京会试，归途中经过上海，购得《瀛环志略》一书，初次接触西学，从此人生道路发生根本变化，他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是年秋天，经同学陈千秋介绍，拜谒康有为，深为其言语折服，次年入康氏万木草堂学习。万木草堂打破了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观念，把求知与救国联系起来，以改造社会为己任。期间，康有为的两部托物言志名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皆由梁启超协助完成。康氏“以大

海潮音，作狮子吼”状批评旧学，宣传改革，使梁氏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梁氏“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①。

1894年，梁启超旅游京师，恰逢甲午战败，“惋惜时局，时有所吐露”^②。次年梁氏入京会试，值逢中日割地赔款之《马关条约》的签订，于是同乃师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梁氏四处活动，联络各省会试举人，向光绪帝陈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之主张。之后的几年中，梁启超遂南北走动，著述讲学，办报立会，力促光绪帝变法维新。期间，他参加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任书记员，主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1896年同汪康年、黄遵宪共同创办《时务报》并担任主笔，“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敝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③。他深信“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④。1897年，梁启超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亲自拟定“学约”，规定教育方针，旨在培养学生“立志”、“乐群”、“治身”、“摄生”、“穷理”、“经世”之人生观，以便将来成为治理国家的专门人才。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梁启超一生第一次可谓惊天动地之壮举，从此梁启超的名字家喻户晓，这次变法对梁氏一生的治学与从政亦有或多或少的潜在影响。变法的最后失败，同仁的从容赴死，在梁氏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同时也激励他继续为救国救民而振臂高呼。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海外流亡生活。赴日不久，即广泛接触西学，“思想为之一

① 《三十自述》，《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958页。

② 同上。

③ 《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④ 《变法通议》，《梁启超全集》第一卷，第14页。

变”^①，期间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政治活动。他于1898年12月创办《清议报》，以“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为宗旨^②，1902年《清议报》停刊后他接着创办了影响颇大的《新民丛报》和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报》。梁氏以报纸为阵地宣传新思想、新知识，以期塑造适应时代之“新民”。他与孙中山多次面谈，交往甚密，共谋大业。与孙中山决裂后，又积极推动立宪政治，为此，他多次赴檀香山、新加坡、澳洲、美洲等地寻求支持。其中，1903年的美国之行，加深了其维新主张，“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③，并断言：以当时中国人的缺点，若行共和制度，“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④。这也最终促使他放弃了革命立场，坚定了走改良主义的道路。

此间，西风东渐，“欧风美雨”一起涌进国内。尤其是西方社会学思想经严复传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无疑给当时处于衰败挨打的中国以最合理的解释，同时在民众中也激起强烈反响。梁启超正值壮年，精力旺盛，救国心切，深厚的国学功底加之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促使他从西学角度反观中国，期间写下的政论性文章和学术随笔均具有开创性。他借西方理论反思中国现状，研究中国历史，解读古典文化，处处彰显出进化论的影子，无不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中号召国人“合大群”、“开人智”^⑤，在《新民说》、

① 《三十自述》，《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959页。

② 《清议报叙例》，《梁启超全集》第一卷，第168页。

③ 《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1158页。

④ 同上书，第1188页。

⑤ 《论中国人种之将来》，《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262页。

《新民议》、《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最早探讨了国民性问题”^①，倡议塑造适应时代潮流之“新民”；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国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等文中以西方近代社会学原理系统论述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之影响，力图从中西地理比较中寻得中国落后之原因，救治祖国；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以西方眼光打量中国史学，猛烈抨击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学，揭起“新史学”大旗，拉开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帷幕。他所倡导的借助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经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研究历史开启了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跨学科研究的先河；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次对中国学术史做了科学的研究，为后学提供了具体的治学范例；在《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倡议“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力求创立“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相效之”的“新文体”^②。另外他还写了大量人物传记，如《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王荆公》、《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以此寄托自己的报国之情、改革之志。

梁启超曾作《过渡时代论》一文，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③。梁氏正是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1905年，清政府垂死挣扎，抛出预备立宪的绣球，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时刻关心国内局势，对每一次改革救国的机会都没有放弃过，这一次他仿佛闻到了改革立宪的芳香，他旋即组织政闻社，创办《政论》

① 夏晓虹：《阅读梁启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页。

② 《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5—86页。

③ 《过渡时代论》，《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64页。

杂志,派人回国四处活动,并信誓旦旦地写下了有关立宪政治的大量文章。据统计,在1910年他发表的66篇文章之中,直接谈宪政的就有22篇之多。除此之外,梁启超对立宪后的国家财政也作了大量设想,一年之中,他亦发表了有关财政的文章近20篇,涉及国债、股权、币制改革等内容。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伊始,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涯回到国内,受到极大欢迎,“如众星之拱北辰”^①,梁氏也踌躇满志,决心在政界一试其锋。之后的八年中,他沉浮于扑朔迷离的政治旋涡中不能自拔。他组织进步党,反对国民党,入主第一流人才内阁,历任袁世凯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及段祺瑞的财政部长,但“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责任感、坦荡率真的性格使得他始终在政界不能左右逢源并险些招致杀身之祸。1915年袁世凯称帝在即,他一气之下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揭露袁世凯改行帝制的实质,明确表达了他反对帝制的决心。继之他又于12月策动其学生蔡锷到云南组织护国军,开展反袁斗争。1916年,康有为等组织筹安会,拥戴张勋复辟,梁启超发表《辟复辟论》,抨击复辟丑行,这一次也公开与乃师康有为决裂。1917年年底,梁启超在出任了段祺瑞政府四个月的财政总长后,自觉只能做“理论的政谭家”而不能胜任“实行的政务家”^②,公开宣布“中止政治生涯”^③,结束其大半生的异常显赫但又屡屡失败的政治生活。期间,梁氏依然笔耕不辍,留有大量有关时政、经济尤其是币制改革方面的文章,这些无疑为后人研究民国初年的经济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当然,

① 《1912年11月1日致梁思顺》,《梁启超全集》第二十一卷,第6107页。

② 《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梁启超全集》第九卷,第2805页。

③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8页。

由于大量公务缠身，这一时期，梁启超的史学文章并不多见，对后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宣布退出政坛的梁启超并非是一真正“神州袖手人”，性格使然，他依然对政治抱有极大热情。1918年，弥漫了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年岁末，梁启超同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勱等人同往欧洲一些国家游历。上船前夕，其与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他再一次反思这些年的政治生涯，“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①。在欧洲游历的一年多里，梁启超一行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其中在法国和英国停留时间最长。他们参观了工厂、学校、银行、博览会、教堂、议会、市政府、剧院、商会、各种社团、名人故居、古战场和“一战”的据点、著名的风景名胜以及一些人的家庭，还发表演讲，交流学术，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同时涉足了正在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亲眼目睹了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真可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欧洲一行给梁启超以极大震撼，往日他用大半生宣传追求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狼藉，科学主义破产、文明衰落，甚至有外国记者寄希望于中国的拯救。梁启超再一次徘徊在十字路口，他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化，并力求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救国根基。

归国后，梁启超开始忙于著述讲学，他于1919—1927年间承办上海的中国公学，付出许多艰辛。此间，公学“前后毕业学生数千人，或留学欧美，或服务社会”，成绩“优越”^②。另外除在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兼课外，他主要执教于清华

① 《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十卷，第2987页。

② 《吴淞中国公学改办大学募捐启》，《梁启超全集》第十卷，第3064页。

大学,与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并称清华园四大名教授。其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讲稿后集结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出版,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有关历史研究法的心得之作;他不断在各学校讲演,内容涉及文化、教育、时政、心理、思想、女学等各个方面;他积极推动中外学术交流,成立共学社并担任社长。共学社先后邀请杜威、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来华讲学。在众多的学术活动中,著书立说是他为后人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是他这一时期的学术史论著;《老子哲学》、《孔子》、《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是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史论著。除此之外,他对佛教用力颇勤,写下了几十万字的佛教论著。当然,他对政治依然投以极大关心,不断对政界指指点点,留有大量时政文章。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梁启超经历了丧妻、失友、病痛之苦。1924年4月18日,梁启超少年时代的导师、青年时代的知音夏曾佑去世,令梁氏非常悲痛,即撰写《亡友夏穗卿先生》以示纪念。9月13日(旧历八月十五),其结发妻子李蕙仙病卒,梁“哀痛之极,悔恨之极”^①。1926年1月他因便血住院,但由于诊治错误被割掉右肾,之后难言病痛时时折磨着他,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1927年3月31日乃师康有为病逝,悲痛之极加重病情。三个月后的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对梁氏的精神无疑是雪上加霜。1929年1月19日,这位颇受争议的政治家兼国学大师以56岁之龄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

^① 《1925年9月29日致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启超全集》第二十一卷,第6221页。

梁启超二十几岁暴得大名，以救亡革新为己任，“报国惟忧或后时”，暮岁之时，潜心治学，“著论求为百世师”。细想起来，梁氏离我们已有近百年时间，但读他的文章，从未有时空的距离感，相反历久而弥新，这也许是他至今仍为学界研究热点的原因吧。

二 梁启超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现状

作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乃至整个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对梁启超的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就史学方面而言，到目前为止，学界已就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渊源、史学思想的前后变化、对历史理论的思考及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性贡献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但如今回顾，他留给学术史的最宝贵财富，可能正在于他援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治史的理念及实践，他的新史学理念之要旨亦在此，而这一方面的研究恰恰是比较薄弱的，本书即试图就此作一点粗浅的叙述和分析。

整个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新旧交替、中西合璧。其发展大致延续两条脉络，一是梁启超于 20 世纪初创立的新史学，二是 20 世纪 20 年代由胡适发起的新汉学。新史学派着重于理论建设，即理念上服膺进化论，治史方法上援用多学科方法，内容上主张为平民作史；而新汉学派则内承乾嘉学派考史但不著史的治史志趣，外援西洋科学的治史方法，在疑古辨伪、整理史料、考证经典等领域大显身手。

新史学于 20 世纪初年以呼风唤雨之势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后很快就退到幕后，之后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称雄史坛的则是新汉学。但新史学虽退居幕后并未销声匿迹，随后崛起的唯物史观派史学承继了新史学的衣钵，其在理论指导、治史内容及方法